

“一带一路”研究

“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 时势评估与前景展望

李世峻 马晓霖

摘 要：随着叙利亚境内国际反恐战争和政权争夺战进入收尾阶段，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努力正在坎坷中推进，叙利亚战后重建也同时开启。政治重建、安全重建和经济重建是叙利亚重建进程中并行不悖且彼此制约的三道难关，最终目的是全面恢复叙利亚的政治秩序与经济社会发展。无论是叙利亚自身对国家重建的迫切需求，还是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和经验，都使“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成为可能。本文基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关于叙利亚冲突的最新观点和数据，结合叙利亚危机的新发展和新形势，对“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的可能性、优势、原则和模式进行客观评估和积极展望。

关键词：“一带一路”；叙利亚冲突；战后重建；政治解决；全面和平

作者简介：李世峻，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9）；马晓霖，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博联社总裁（北京100054）。

文章编号：1673-5161(2018)02-0076-14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自 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至今,叙利亚国内冲突在大国干涉和多方介入下已延续七年之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前,叙利亚局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7 年 11 月至 12 月,伊朗、俄罗斯、伊拉克先后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被击溃;12 月 7 日,俄总参谋长盖拉西莫夫表示叙利亚已经完全从“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下解放出来;11 日,普京突访俄在叙利亚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宣布将从叙撤军。同月,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和阿斯塔纳和谈分别于 14 日和 22 日结束。2018 年 1 月 30 日,叙利亚全国对话会议在俄罗斯索契圆满闭幕,这一和解进程所取得的关键性进展,为战后的“新叙利亚”国家政治构架完成了“封顶兜底”。^① 纵使举步维艰,通过和平谈判最终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可能性正与日俱增,叙利亚战后重建工作也正逐步由幕后移至台前,各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叙利亚重建的猜测与期待之声愈益高涨。在新形势下,认清叙利亚重建面临的现实困境对中国参与叙战后重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叙利亚重建进程的“三重难关”

叙利亚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叙战后重建至少面临“三重难关”的考验。

(一) 政治重建

随着作为政治实体存在的“伊斯兰国”的覆灭,叙境内的反恐战争已近尾声,“后‘伊斯兰国’时代”的政治重建是关乎叙利亚重建整体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在短期内很难取得有效突破,至少面临三个方面的不确定性。

第一,重建机制尚未出台。迄今为止,曾在推动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过程中发挥过作用的多边机制主要包括维也纳和谈机制(Vienna Peace Talks)、日内瓦和谈机制(Geneva Peace Talks)和阿斯塔纳和谈机制(Astana Peace Talks)。由于缺乏当事国的直接参与,维也纳机制颇受诟病,更由于土耳其的态度转变而鲜有进展;日内瓦机制和阿斯塔纳机制随之成为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两个关键平台。然而,无论日内瓦机制还是阿斯塔纳机制,目前均不具备全面展开和推进叙利亚政治重建的足够能力和条件。首先,日内瓦和谈因“巴沙尔去留”等关键问题而久谈未果,更因俄罗斯的排斥和冷落难显成效。其次,阿斯塔纳和谈自 2017 年 1 月启动以来迅速形成机制,取得了停火、换囚、建立“冲突降级区”等重要成果,进而超越日内瓦机制成为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主要机制,随之演变成各方争夺叙利亚问题主导权的重要平台。然而,将阿斯塔纳和谈机制的成果融入日内瓦机制中并加以贯彻和落实非常困难。当前,由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国主导的阿斯塔纳机制与以联合国名义但由美国、欧

^① 马晓霖:《索契决议:为叙利亚统一与完整“封顶兜底”》,载《华夏时报》2018 年 2 月 3 日,第 37 版。

盟、沙特等国主导的日内瓦机制大有分庭抗礼之意,不排除导致各方博弈加剧的可能性。包括叙利亚反对派、美国等在内的有关各方能否积极响应阿斯塔纳机制所取得的成果,直接关乎新的政治重建机制能否出台,关乎真正融合各方力量、围绕重建事宜展开多边商讨的叙利亚重建国际会议能否尽早召开,并最终关乎叙利亚的政治重建能否实现。

第二,国家政体和意识形态走向不明。在 2017 年 10 月 31 日落幕的第七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中,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俄总统叙利亚问题特使拉夫连季耶夫表示,“不排除商讨建立叙利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可能性”^①。然而,所谓“民族统一政府”究竟采取中央集权制、联邦制还是邦联制,多方势力必各有打算。在当前形势和条件下,巴沙尔政府试图让叙利亚重回大一统局面存在极大困难;同样,使叙利亚分崩离析成为若干独立主权的国家也不现实。

在政体选择方面,未来叙利亚大致存在三种可能:保留原有的单一共和制;选择黎巴嫩模式或伊拉克模式,成为一个内部高度自治的联邦制国家,按教派和民族划分权力并使之相互制衡;形成一种介于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分权体制之间的“共和国主体+若干联邦区”的新型体制,在单一共和制的体制下给予库尔德人一定限度的自治权。这三种可能都维持了巴沙尔在大马士革的继续统治。^②

在意识形态层面,不仅反政府的政治力量会抵制复兴社会主义,库尔德人也排斥阿拉伯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和集权型共和观念都可能再次复兴。鉴于战后伊拉克的教训,叙政府和俄罗斯不会轻易放弃复兴社会主义道路而选择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后萨达姆时代,正是由于匆忙解散复兴党致使国家因长期统辖各派的超级意识形态突然消失而成为一盘散沙。当然,未来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也不排除作出调整和局部妥协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叙利亚政体和意识形态的未来走向取决于内部各派力量的博弈,也取决于域外大国的角力,形势至今并不明朗。

第三,阿拉伯身份去留存疑。叙利亚政治重建终究面临阿拉伯身份去或留的两难抉择。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势力独立于叙政府军和叙反对派而存在的一项重要原因,是后两者均以“歧视和‘阿拉伯化’库尔德人”为目标。^③作为叙利亚库尔德族群的核心诉求之一,“去阿拉伯化”是库尔德人在未来政治重建进程中与叙政府角逐的主要议题之一。同样,叙境内的亚美尼亚和土库曼等少数民族也乐见未来国家去“阿拉伯化”标签。另一方面,启动政治重建的叙利亚政府将考虑是否以及如何重返

^① 周翰博:《阿斯塔纳和谈带来和平曙光——各方重申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载《人民日报》2017 年 11 月 2 日,第 21 版。

^② Zachary Laub, “What to Watch for in Post-ISIS Iraq and Syri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October 19, 2017,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what-watch-post-isis-iraq-and-syria>,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27 日。

^③ Ari Soffer, “The ‘Non-Arab Spring’?” *Arutz Sheva*, September 18, 2017, <https://www.israelnationalnews.com/Articles/Article.aspx/13847>,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29 日。

阿盟,特别是如何修复与海合会(GCC)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叙利亚如果为争取内部稳定和政权延续而尊重“去阿拉伯化”诉求,则难免引起外部相关国家的不满和反对。如何在弥合内部分歧和排除外界忧虑之间权衡利弊将成为考验叙利亚政府的又一难题。

总之,叙政治重建进程前途未卜,叙政府掌控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因而一时间难以恢复至较高水平,客观上增加了政局不稳和战乱、恐怖主义借机反弹的风险。

(二) 安全重建

在叙利亚危机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虽然反恐已降级为次要任务,叙利亚重建进程中的安全重建环节——旨在实现全面停战以及解决战乱带来的诸多安全问题,仍然是当前叙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整体重建进程能否有效推进的保障。当前,叙利亚安全重建大致面临五大难题。

第一,“冲突降级区”发展难题。2017年9月15日,第六轮阿斯塔纳和谈机制确定暂以六个月为有效期在叙利亚建立四个冲突降级区,从而使俄、土、伊三国率先为实现叙利亚全面停火和地区稳定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截至2017年12月,这一过渡性质的举措为降低地区冲突烈度和缓解人道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使各方在打击地区极端恐怖组织方面取得了实质进展,叙政府也由此重新掌控了境内大片领土。然而,叙利亚战争是一场大国干涉和地区力量介入相交织的冲突和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①这就意味着任何停火协议能否长期有效执行、“冲突降级区”在下一阶段将如何发展均会受到各方博弈情势的直接影响。未来,在政治解决进程稳步推进的前提下,以俄、土、伊为主导的冲突降级区极有可能迎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介入,使冲突降级区转为相对的稳定“板块”,最终伴随政治解决的成功而完成其历史使命;相反,若政治解决不进反退,在恐怖主义这一共同敌人的短暂缺席下,各方暴露出的直接利益冲突和控制权争夺甚至可能导致“冲突降级区”变为“冲突升级区”。

第二,反恐收尾阶段难题。在各国宣布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取得胜利之前,“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在叙利亚的规模远超伊拉克。^②虽然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有形力量已被大大削弱,但其仍在流窜中的无形力量依然具备发动零星恐怖袭击的能力,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潜在且持续的威胁。因此,包括叙利亚内战各方在内的反恐力量在叙反恐收尾阶段至少面临三大任务:为应对恐怖主义在地区发生的新变化,对化整为零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力量进行再次定性甄别;联手防范流窜中的恐怖组织有生力量进入别国或反恐阵营的管辖盲区以求再起;防止大国或地区国家出于私利而与被击溃的恐怖组织暗中合作,使其卷土重来。

^① 马晓霖:《“奥巴马主义”与叙利亚危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1期,第61页。

^② Zachary Laub, “What to Watch for in Post-ISIS Iraq and Syria”.

第三,政府军恢复与重建难题。在叙利亚安全重建进程中,政府军的恢复与重建事关叙政府掌控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内战爆发前,叙政府逐年减少义务兵役期限,至 2011 年,原有兵役期限已缩减到一年半,显示出政府军健康、良好的发展势头。^① 自叙内战爆发至 2014 年底,因伤亡、变节和拒服兵役,叙政府军人数从 32.5 万人锐减至 15 万人,非正规部队则有 8 万到 10 万折损。^② 在此过程中,叙政府转而通过颁布新规定、抓捕兵勇乃至强迫已服兵役的公民接受预备役等措施扩充政府军兵员,客观上致使政府军整体质量大不如前,并引发了民怨。叙政府面临尽快在数量和质量上帮助政府军进行恢复和重建以及安抚民心的不小考验。

第四,遣散与整合反政府武装及收缴武器难题。除政府军外,在叙内战中出现的各种名目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多达上千个,其中的大部分规模较小且由地方掌控,同时不乏由多个武装力量结盟而成或受到域外大国支持且颇具影响力的非政府武装组织。^③ 其中,以受美国力挺、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以及由土耳其扶持的“叙利亚自由军”和“土库曼旅”等叙反对派军事组织最具代表性。“伊斯兰国”武装的势力衰退不可避免将引发地区及域外大国围绕领土、控制力和影响力展开竞赛和角逐。^④ 随着反恐战争进入尾声和重建进程的开启,叙政府对各类民间和地方武装或遣散或整合,对曾经的反政府力量进行武器收缴成为安全重建的重要内容,却又面临地区多元博弈带来的极端复杂性。可供对照的负面例证是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国家政权破碎、军事割据、恐怖分子活动猖獗的现实。

第五,土耳其“安全区”的存废难题。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土耳其方面曾多次提出在叙北部地区建立“安全区”或“禁飞区”。这一动议首先针对域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同时针对被土耳其视为心腹大患的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其实质是假反恐之名行维护本国领土安全和利益之实。虽然在奥巴马时代这一提议被多次忽视,但时至今日,土耳其在叙北部“安全区”的建立却已成为不可否认的既定事实。无论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中东政策的转变,还是“伊斯兰国”势力的逐步褪去,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安全区”的巩固。因此,现阶段土耳其“安全区”的存在并不会随着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的衰退而轻易走向终结。然而,“安全区”的存在又不可避免地使叙政府以及其他域内和域外大国心存芥蒂。未来,若库尔德人仅谋求自治而不再设法独立,则“安全区”的存在不复必要;相反,则会给予“安全区”存在以合理的口实,为地区安全重建平添许多不确定性。

① “Syria Reduces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by Three Months,” *China Daily*, March 20, 2011.

② “Syria Increasing Efforts to Build up Military after Substantial Loss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29, 2014.

③ “Guide to the Syrian Rebels,” *BBC*, December 13, 2013,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4403003>, 登录时间:2017 年 12 月 2 日。

④ Louisa Loveluck and Loveday Morris, “As ISIS Retreats in Syria, U.S. and Iran Scramble for Control,”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7, 2017.

“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叙利亚安全重建道阻且长,战乱状态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战后权力分割、族群冲突和各方博弈将长期存在,叙利亚与沙特、土耳其、以色列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存在恶化的较大可能。安全重建能否顺利进行尚取决于以美、俄为代表的大国将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以及如何形成联合政府控制下的有效安全力量这两大关键问题。

(三) 经济重建

如果说政治重建和安全重建是叙利亚重建进程的前提和保障,经济重建则是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无论叙政府和博弈中的各方针对政治重建和安全重建做出怎样的布局,民生问题始终应为解决问题的目标所在,并影响着政治重建和安全重建进程的顺利推进。

叙利亚曾经是中东地区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封闭的国家之一。除少量石油外,叙本国资源相对匮乏。然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6年出台的一份涉及叙利亚冲突与经济的专项报告,至21世纪初,叙利亚政府逐步实行包括开放商业银行和股票交易、寻求加入世贸组织等经济自由化的举措,已帮助叙利亚经济保持了低通胀率和强劲的增长势头,财政赤字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内,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的发展。^①内战前的叙利亚是一个高度城镇化的国家,至2010年共有2,881,392个不同类型的住房单位分布在八个省份,叙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6%。^②然而,内战爆发以来,叙经济遭受巨大打击,虽然经济重建工作已在启动当中,却仍然面临诸多困难,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伤亡人数巨大,经济倒退严重。据世界银行估算,2010年叙人口总数约为2,210万,在2011年至2016年间至少缩水20%,约1,000万人流离失所或被迫迁移。^③有关叙利亚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叙利亚危机联合国与阿盟联合特使(UN and Arab League Envoy to Syria)、叙利亚政策研究中心(Syrian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和叙利亚人权观察站(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分别作出40万(2011年3月15日至2016年4月23日)^④、47万(2011年3月15日至2016年2

^① Jeanne Gobat and Kristina Kostial, “IMF Working Paper: Syria’s Conflict Economy,” *IMF*, June 2016, p. 3,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6/wp16123.pdf>, 登录时间:2018年2月6日。

^② “The Toll of Wa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flict in Syria,” *World Bank Group*, July 10, 2017, p. 21, <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syria/publication/the-toll-of-war-the-economic-and-social-consequences-of-the-conflict-in-syria>, 登录时间:2018年2月5日。

^③ Jeanne Gobat and Kristina Kostial, “IMF Working Paper: Syria’s Conflict Economy,” p. 6.

^④ “Syria Death Toll: UN Envoy Estimates 400,000 Killed,” *Al Jazeera*, April 24, 2016,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6/04/staffan-de-mistura-400000-killed-syria-civil-war-160423055735629.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2月6日。

月 11 日)^①和 47.5 万(2011 年 3 月 15 日至 2017 年 7 月 15 日)^②的统计;另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因内战致残人数多达 80 万之众。联合国相关机构统计显示,截至 2017 年 4 月,叙利亚内战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3,500 亿美元,^③该数值为 2010 年叙利亚 GDP 的 5 倍有余。叙利亚内战冲突对叙实物资本造成了严重损害。据世行统计,叙境内 7% 的建筑被彻底摧毁,20% 遭不同程度损坏,65% 的住房单位遭到破坏,^④客观上加剧了民众的颠沛流离。

战争带来的损失更渗透到叙国家基础设施的各个层面:包括阿勒颇、台德穆尔、代尔祖尔等九个城市的数十个工业区遭到破坏,其中阿勒颇受损最为严重;霍姆斯、大马士革等城市以及许多小城镇由于成为战场而遭破坏甚至彻底毁灭,为当地居民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工厂、土地、道路、发电厂和灌溉系统以及旅游机构等大部分设施遭到破坏,民众几无医疗、学校等基本公共服务享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至 2013 年初,叙利亚 30 多个电站停运,至少 40% 的高压线路遭到破坏;由于基础设施受损,叙利亚在霍姆斯和巴尼亚斯的两家国有炼油厂运营能力减半;^⑤叙利亚总长度达 2,423 公里的铁路系统由于战争破坏已无法运营^⑥。据世界银行 2017 年 2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叙全国 16% 的医疗机构(含综合医院、医疗中心、医疗点)被彻底摧毁,42% 遭到部分损坏,^⑦不仅需要急诊的患者无法得到应有救护,慢性病患者以及妇女和儿童均无法获得适当的治疗。^⑧种种迹象表明,叙利亚经济倒退严重,恢复周期将十分漫长。据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分析,叙经济至少需要 30 年才能恢复至战前水平。^⑨

其次,重建资金缺口巨大,叙本国投融资能力极其有限。据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ESCWA)2016 年估算,仅叙利亚经济重建中的基础设施恢复部分就至少

① Priyanka Boghani, "A Staggering New Death Toll for Syria's War - 470,000," *PBS*, February 11, 2016, <https://www.pbs.org/wgbh/frontline/article/a-staggering-new-death-toll-for-syrias-war-470000/>, 登录时间:2017 年 12 月 6 日。

② "About 475 Thousand Persons Were Killed in 76 Months of the Syrian Revolution and More than 14 million Were Wounded and Displaced," *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 16 July, 2017, <http://www.syria.hr.com/en/?p=70012>, 登录时间:2017 年 12 月 9 日。

③ Hashem Osseiran, "The Likely Winners in the Race to Rebuild Syria," *News Deeply*, September 13, 2017, <https://www.newsdeeply.com/syria/community/2017/09/13/the-likely-winners-in-the-race-to-rebuild-syria>, 登录时间:2017 年 12 月 13 日。

④ "The Toll of Wa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flict in Syria," p. 21.

⑤ Jeanne Gobat and Kristina Kostial, "IMF Working Paper: Syria's Conflict Economy," p. 10.

⑥ "The Toll of Wa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flict in Syria," p. 36.

⑦ *Ibid.*, p. 38.

⑧ *Ibid.*, p. 41.

⑨ Mona Alami, "Assad Wants to Rule Syria, but Economics Say Otherwise," *News Deeply*, October 24, 2016, <https://www.newsdeeply.com/syria/articles/2016/10/24/assad-wants-to-rule-syria-but-economics-say-otherwise>, 登录时间:2017 年 12 月 14 日。

需要 2,000 亿美元才能完成,^①加上其他领域的资金需求,叙利亚重建面临近 3,000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相较于战前,日益累积的国家债务已使叙利亚政府难堪重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叙政府公债在 2009 年底仅占 GDP 的 31%,至 2015 年底则一跃达到 GDP 的 100%;外债占 GDP 比重则由 2009 年的 9%跃升至 2015 年的 60%。^②此外,叙政府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其投资、融资和偿付能力均受到极大限制。从 2011 到 2015 年,伊朗被普遍视为叙利亚唯一来自外部的财政“靠山”,得益于伊朗的帮助,叙政府才能够为市场提供足够的石油产品,^③这对于一度风雨飘摇且无力产油的叙政府而言无疑至关重要。叙政府于 2016 年 1 月通过了旨在借助私有经济管理和运营国有产业(石油领域除外)的“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法案,次月又正式启动名为“国家伙伴关系”(National Partnership)的新经济战略以促进本国经济重建,多个政府项目已经上马。^④然而,鉴于“PPP”计划所依赖的本国银行并不具备足以支撑重建的资本,私有经济的注资对叙利亚国家经济重建而言仍然远远不够。

最后,叙战后重建缺乏大国一致,援助模式难寻先例。数额庞大的重建资金缺口首先意味着如果没有大量的国际援助和贷款,重建工作就不可能完成。然而,叙利亚的经济重建进程与叙利亚问题本身一样,因反恐和争夺政权的双重属性以及大国博弈的长期存在而具有十分特殊的复杂性。各方在政治解决中的分歧势必折射和作用在经济重建的过程中。这些现实的直接影响,首先体现在叙利亚经济重建进程将有别于阿富汗、伊拉克等以美、欧为主体且大国展现出相对一致的国家重建进程,其次体现在国际社会对叙利亚经济重建的援助模式将无先例可寻。

在遭受西方经济封锁、外交孤立的背景下,包括巴沙尔在内的叙各级别官员均曾多次表示,“盟国”企业在重建进程中享有优先权,而欧美企业则首先需要以其政府为支持反对派的立场进行道歉来换取在重建中获利。“大马士革当前对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也采取类似的立场。”^⑤可以预见,包括俄罗斯、伊朗、中国、印度等在内的“东方国家”将成为叙政府寻求经济援助与支持的主要对象。美、欧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挺叛”、“倒巴”且乐见叙政府遭遇掣肘的实际立场,且始终担忧重建资金终

① “The Toll of Wa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flict in Syria,” p. 20.

② Jeanne Gobat and Kristina Kostial, “IMF Working Paper: Syria’s Conflict Economy,” p. 17.

③ Katarina Montgomery, “Syria Won’t Recover for Decades’ - An Expert’s View on The Cost of War on The Country,” *News Deeply*, June 16, 2015, <https://www.newsdeeply.com/syria/articles/2015/06/16/syria-wont-recover-for-decades-an-experts-view-on-the-cost-of-war-on-the-country>, 登录时间:2017年11月30日。

④ Hashem Osseiran, “The Likely Winners in the Race to Rebuild Syria,” *News Deeply*, September 13, 2017, <https://www.newsdeeply.com/syria/community/2017/09/13/the-likely-winners-in-the-race-to-rebuild-syria>, 登录时间:2017年12月8日。

⑤ Ibid.

将落入巴沙尔亲信或效忠于他的代理人手中。^① 而以沙特为代表、曾长期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阿拉伯国家同样很难迅速转身成为叙政府的援助者。

纵然有意参与重建,各国的参与程度和援助模式也将大大异于以往。二战后,美国为支持欧洲重建曾向马歇尔计划捐款约 130 亿美元,相当于今日 1,000 亿美元有余,却不及今日叙利亚一国重建所需数目。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经济体被普遍寄予慷慨解囊的期望,但即使每年做出援助数十亿美元的联合承诺,预计十年内可满足的需求也不会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对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家而言,受油价走势和预算紧缩影响,其潜在的援助规模也会远不及实际所需。^②

除上述困难外,叙战后重建进程中本国企业运营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建设尚待完善,货币交易和银行监督能力有待重建与加强,银行监管框架亟待改革,其中的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制度更有待尽早建立。

对叙利亚战后整体重建而言,政治重建、安全重建和经济重建环环相扣、互为支撑,叙利亚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三者唯有齐头并进、相互扶持,才能使重建进程有序开展、重建目标早日达成。

二、“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重建的可能性与优势

随着叙利亚局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叙国内形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备走向相对稳定的可能。面对满面疮痍、百废待兴的战后叙利亚,“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的现实基础、可能性与优势等问题正引起中国企业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叙利亚重建面临“三重难关”的考验,“一带一路”对接叙战后重建仍具有充分的可能性与优势,也同样需要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整体考量。

在叙利亚方面,随着反恐战争进入尾声和“冲突降级区”作用的凸显,较之以往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使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参与叙利亚重建成为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全面和平的实现意味着叙利亚重建投资的需求也是全方位的。百废待兴的经济现状和规模庞大的投资需求客观上为中资企业提供了不应忽视的商机和发展机遇。2016 年至 2017 年,包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叙副总理穆阿利姆、叙驻华大使穆斯塔法等在内的多位政要利用各类场合表达了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支持和中国参与叙利亚重建的欢迎态度,展示出对中国一直以来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处理叙利亚问题且力促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的尊重和欢迎,这无疑为未来中国在重

^① Zachary Laub, “What to Watch for in Post-ISIS Iraq and Syria”.

^② Perry Cammack, “The Staggering Price of Syria’s Reconstruction,” *News Deeply*, February 11, 2016, <https://www.newsdeeply.com/syria/community/2016/02/11/the-staggering-price-of-syrias-reconstruction>, 登录时间:2017 年 12 月 16 日。

建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了政治基础。

在中国方面，“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重建既存在可能性也具备多方面的优势。

第一，中叙传统友谊深厚。自1956年建交至今，两国始终保持着多领域的密切、友好关系。自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秉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多次对联合国安理会就涉及叙利亚的决议草案动用否决权，并先后发出了“六点主张”^①、“三点坚持”^②等把维护叙利亚根本利益、中东和平稳定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强有力声明，要求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切实尊重叙利亚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叙利亚人民自由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③为避免使叙利亚进一步陷入灾难发挥了重要作用，叙利亚及中东局势的后续进展无一不验证了中国政策的“深谋远虑”。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以各种形式向叙方无偿提供了规模可观的人道主义援助。2017年1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宣布中国决定提供2亿元人民币新的人道主义援助，用于帮助叙利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④可以说，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双重支持，为中国参与叙重建赢得了来自叙政府和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支持。

第二，良好的中叙、中俄、中伊关系为中国参与重建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外交基础。除联合国多边会议外，中国领导人始终不遗余力地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以及同有关国家政要的双边会谈等国际场合强调和重申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坚定立场。中俄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展现出的“默契”，客观上也为叙利亚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2012年，面对爆发不久的叙利亚危机，第十二次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军事干预中东，并呼吁通过对话寻求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途径。2013年的叙利亚“化武风波”引发了西方多国对叙政府的新一轮声讨，武力干预叙利亚危机的可能性一时间大幅增加。5月，中、俄两国领导人在圣彼得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对叙利亚实行军事干预只会使中东局势更加动荡，政治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关于叙利亚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坚定的，鲜明的。而与俄方彼此协调一致、相

^① 2012年3月4日，中国提出了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六点主张”，敦促停止使用武力，倡导不带先决条件、不预设结果的包容性政治对话，以叙利亚国内秩序稳定、国家安全为基础，积极推动政治协商解决危机。

^② 2015年12月4日，中国外长王毅在与叙利亚副总统兼外长穆阿利姆的会谈中提出贯穿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始终的“三点坚持”：一是坚持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方向，二是坚持由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叙利亚的前途与未来，三是坚持由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

^③ 马伟：《中国在联合国多边外交平台下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与政策》，载周烈、肖凌主编：《阿拉伯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

^④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日内瓦）》，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向而行,也是早已形成的默契。^①

第三,得益于自身发展成果和参与外援、重建项目的丰富经验,中国在资金、技术、人才、装备等领域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专业优势。在经贸领域,中国正稳步开展企业参与叙利亚重建的各类前期交流和试水,中方企业也显示出积极的参与姿态。2017年5月4日,由中国阿拉伯交流协会主办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与重建机遇——中国阿拉伯交流协会访问叙利亚情况介绍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阿拉伯交流协会重点发布了叙利亚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建材、农业等各类重建项目,得到了所有参会企业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包括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大唐集团、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中冶集团、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钢设备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众多知名中国企业纷纷表示,愿意参与叙利亚战后重建工作。^②

2017年5月15日,为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举措,同时为进一步加强中叙双边务实合作,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齐前进与叙利亚计划与国际合作署署长伊马德·萨布尼分别代表中、叙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向叙方提供无偿援助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以及关于向叙方提供紧急粮食援助的换文。^③同月,为推动中国与叙利亚企业界交流,由中国贸促会组织的中国—叙利亚企业对接交流会也在北京成功举办。会上,叙利亚企业家代表团就叙利亚经济现状、投资环境和投资机遇进行了详细介绍,来自中叙两国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等领域的150余位企业代表与会,进行了叙利亚重建大幕拉开以来的首次中叙企业对口交流,^④为两国企业的后续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7年8月,在第59届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期间,有20余家中国企业参与了展出,产品涉及能源、建材、汽车、家具、机械装备、家用电器等多个领域,显示出中国企业对叙利亚市场的浓厚兴趣和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12月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企业重视与叙利亚开展经贸合作,“我们鼓励中国企业继续加强与叙利亚企业的交流,在切实做好安全保障工作的前提下,探讨参与叙利亚的重建”^⑤。

第四,“一带一路”建设正稳步推进,且成效明显。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包括建立了广泛的合作机制、支撑体系不断完善、重

① 薛宝生:《中俄对叙一致立场释放强大和平之力》,中国网,2013年9月6日,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39_81139.html,登录时间:2018年1月14日。

② 红鸿:《叙利亚战后重建会议首次在北京举行》,载《中国企业报》2017年5月16日,第7版。

③ 车宏亮:《中国政府再次向叙利亚提供人道援助》,新华网,2017年5月16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5/16/c_1120976839.htm,登录时间:2018年1月8日。

④ 《中国—叙利亚企业对接交流会在京成功举办》,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17年5月11日,<http://sy.mofcom.gov.cn/article/zxhz/201705/20170502573656.shtml>,登录时间:2018年1月7日。

⑤ 史凯:《中国愿适时探讨参与叙利亚重建》,载《国际商报》2017年12月8日,第A03版。

大项目批量落地、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影响力不断提升^①，尤其是中国企业参与科威特、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战后重建积累的丰富经验，均使“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重建更具底气。

第五，参与叙战后重建成为中国突破自身发展瓶颈重要的潜在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面临产能过剩、环境压力大、经济发展成本增加、贸易壁垒频现、外汇储备过剩等新问题和新压力。从产能角度来看，截至2016年，中国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②，其中8种严重过剩^③。随着“去产能”工作的进一步推进，轻工、家电、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富余产能优势产业将加快“走出去”步伐，工程机械、交通设备等装备制造业生产能力和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从而为“一带一路”在产能合作领域与叙利亚战后重建相对接提供直接的便利。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为最大限度地争取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和帮助叙利亚实现真正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为应对世界经济的“逆全球化”贡献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引领全球化进程的责任与担当。^④“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不仅是中国一贯支持和帮助叙政府和人民政策的延续，也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并体现大国责任的有力彰显。

三、“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的原则与模式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鉴于中东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参与叙利亚战后重建的焦点正由“能否参与重建”转向“如何参与重建”。面对叙利亚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一带一路”对接叙战后重建尚需尽早制定相应的原则，规划可能的模式。

（一）“一带一路”对叙利亚战后重建应坚持的原则

结合叙利亚重建所面临的“三重难关”考验和“一带一路”对接重建的可能性与优势，当前中国参与叙利亚战后重建至少应坚持三项原则：第一，坚定不移帮助叙利

① 顾阳：《“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稳步推进》，载《经济日报》2017年5月13日，第3版。

② 于佳欣、吴雨、白林：《220多个“世界第一”背后的尴尬怎么破？》，新华网，2016年3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04/c_1118237021.htm，登录时间：2017年11月27日。

③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不完全的官方统计，2016年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只有72%、73.7%、71.9%、73.1%和75%；汽车、光伏和风电行业则面临50%的产能过剩率。

④ 徐秀军：《引领全球化进程的中国责任与担当》，中国日报网，2017年1月20日，http://china.chinadaily.com.cn/2017-01/20/content_28008705.htm，登录时间：2017年11月28日。

亚恢复和平与稳定,支持叙政府巩固政治重建与安全重建,为“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第二,考察先行,渐进式开展。鉴于叙利亚局势尚未完全稳定,多元博弈情势复杂,恐怖主义威胁并未完全根除,应在充分考察和调研的前提下坚持渐进式开展,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鼓励和引导企业在参与重建前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调研和风险评估,充分发挥中国优势,让作为参与重建“排头兵”的企业时刻感受到身后坚实、可靠的政策支持。第三,坚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共商、共建、共享”^①原则,坚持政府顶层设计、企业自主选择、以市场为导向相结合,支持和鼓励企业“走出去”,在强化企业风险防范意识、提升其风险应对处置能力^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潜力。

(二) “多国多方”模式展望

国际社会对叙利亚经济战后重建的援助模式无先例可寻,而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同样需要拓展思路,规划新的对接模式。首先,面对欧美、海湾阿拉伯国家等重建事业传统“金库”可以预见的缺席,结合叙政府和人民所展现出的“向东看”意愿,未来以叙、中、俄、伊(朗)等国为重建主体,旨在共迎机遇、共担风险、共负成本、共享收益的新型重建模式正在酝酿。在此模式下,预计多国实际形成的“重建联合体”不仅可以满足叙利亚战后重建千亿美元级别的资金需求,更能有效利用原本有限的叙利亚国内市场,分散各国参与重建的风险和压力。在全面和平实现以后,可进一步参照中国在中缅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中首创的“四国六方”^③合作模式,以铁路、公路、电力、水处理、通讯设施建设为依托,使地区国家形成战略利益相互捆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崭新局面。其次,“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重建的渐进式开展应从相对安全的地区和更具需求的领域入手,进而逐步拓展至其他与叙利亚民生问题息息相关的领域。未来一段时期内,帮助和支持叙利亚基础设施恢复和建设将始终是参与战后重建的主题,除至关重要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建设外,医疗设施与器械、石油管线和设备的恢复与修复,以及叙利亚境内尚存文物的修复与保护等都是“多国多方”模式下中国企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潜在领域。

总体来看,中国政府的稳步推动和企业的积极参与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在经贸领域参与叙利亚重建的主基调;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企业将在与叙利亚民生和基建相关的重点领域发挥自身强大的作用,为“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重建打造愈发坚实和广泛的平台。

① 何奕萍、王昕:《习近平: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人民网,2014年6月5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605/c64094-25108950.html>,登录时间:2017年12月22日。

② 《“一带一路”企业影响力榜单揭晓 四点建议助企业“走出去”》,中国一带一路网,2017年12月21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40529.htm>,登录时间:2017年12月23日。

③ 张立岩、王晓群:《“四国六方”能源合作新模式——东南亚管道公司国际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载《中国石油报》2014年1月20日,第4版。

四、余论

“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的挑战与机遇共存、风险与商机并行。未来一段时期内,叙利亚境内战乱和冲突的影响难以立刻消弭,大国干涉和多元博弈以及族群对立的局面长期存在,暴力恐怖活动伺机而动,这些现实客观上构成了中国与地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利因素。然而,阿斯塔纳机制和日内瓦机制“双轨”正在稳中推进,美、俄等国在叙的军事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地区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但相对稳定的局面,即使俄罗斯已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其在叙境内的军事基地仍将成为未来俄在叙常驻部队的有力依托,为巴沙尔政府稳步开展政治重建和安全重建提供支撑和保障。同时,各国正在加大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斡旋力度,全面和平的实现已现曙光。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中东局势如何复杂,中国都不会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打退堂鼓。

中东国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的参与力量与合作对象,中国的中东政策必将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有利于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真正实现,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归根结底,中国坚持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重视以民生问题为核心的发展理念、不以价值观绑架现实问题的思路一直能够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共鸣。^①“一带一路”与叙利亚战后重建的对接有望成为这一共鸣的最新例证。

总之,在努力规避风险、做足准备、量力而行的前提下,中国应以乐观、积极的态度看待“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的前景,把握历史机遇,使“对接”真正有效而务实,帮助叙利亚早日实现和平、稳定与发展。

(责任编辑:章远)

^① 刘波:《参与叙利亚重建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2月16日,第4版。